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 主编

水德配天

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

张亚辉 / 著

民族出版社

张亚辉著

PDC

本书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当代民族问题战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系该中心课题成果

人文田野丛书

王铭铭 / 主编

水德配天

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

张亚辉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张亚辉
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12
(人文田野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09783 - 8

I. 水… II. 张… III. 汉族—村落—民族社会学—研究
报告—太原市 IV. 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4790 号

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

著 者：张亚辉

策划编辑：倩 男

责任编辑：冯 光

责任印制：石小娟

封面设计：吾 要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电 话：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58130160

010-64228001 (传 真)

010-64224782 (发行部)

<http://www.mzcbs.com>

投稿信箱：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民族印刷厂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63 千字

印 张：10.125

定 价：29.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783 - 8/K · 1514 (汉 697)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前言

本书是一份通过灌溉研究汉人村落的历史民族志报告，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本研究的田野地点在山西太原的晋祠灌区。经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和大量的资料整理，我力求详尽地梳理晋祠灌区的灌溉历史及现状以及村落在生活和仪式中的用水情况。从文化理性的视角出发，我认为，晋祠的灌溉史须在难老泉的文化意义和当地的水神崇拜的历史基础上得到理解。

在晋祠，水既被看做一种通阴间的物质，又被看做是天道的隐喻。在汉人的“道德宇宙观”当中，水的这两种存在观念得到了统一，而这又影响了晋祠的水神崇拜历史。本文关注的历史从宋代初年开始，赵宋征伐北汉，并且水灌晋阳古城的行为直到今天仍旧为当地人所愤恨。这场不义战争导致了大量水鬼被困在难老泉内，灌溉一度废弃，后来国家树立了一个女神昭济圣母来解决此事，却又因为与唐叔虞信仰的冲突而导致了更多的矛盾。当地人将昭济圣母理解成本地人柳春英，进而又出现了水母和圣母身份的混淆。这一混乱局面最终以将昭济圣母认定为邑姜，而柳春英独立成水神结束。这些神灵变动不居的历史直接影响了当地对水利的分配和对水权的界定。明代初年，晋王屯军进入晋祠灌区，占用了大量土地和水源，也对渠长甲制度、水利分配、村落关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站营村成为晋水唯一占据“副都渠长”位置的村落，并在清代到民国的灌溉历史当中享有特权。新

中国成立后，难老泉水分了很大一部分支援工业建设，当地开始使用污水灌溉。渠长甲制度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已经废除了，但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72年，这一年，晋祠的水利管理彻底国家化了。1994年，难老泉干涸，如今的灌溉全部依赖污水，灌溉面积迅速萎缩。

通过以上梳理，我希望说明，以“生”的观念为核心的“道德宇宙观”是理解汉人社会的基础所在。天命国家的道德性与民间道德是相互贯通的，原本就属于一个道德系统。所谓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单是相对反的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至少对晋祠灌区来说，这两者处于礼治的连续统中的等级关系是更加重要的。从水利研究的角度看，当地的历史其实也就是在“污染——净化”的循环中展开的。我也努力从“祈福宗教”与“道德宗教”这一对概念中来思考民间宗教与礼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德福一致”或者说“好人好报（运）”是汉人民间宗教的基础观念。当地人讲，一个村子人情好，所以水就好，这种德性与存在之间的关联是汉人思考和想象世界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当地村落之间分配水权的根本依据。从这里出发，可以将民间宗教和礼统一在道德宇宙观之下。在道德宇宙观当中，可以看到，汉人社会与水、与土的联系并不能完全看做来自生产实践，而是以德性上的联系为基础的。

这里，我要将最诚挚的谢意献给我的导师王铭铭教授，是他将我带入了学术研究的殿堂，并向我展示了这个殿堂的伟大、辉煌和深邃。我年届三十方有志于学，承蒙王老师不弃，四年来耳提面命，费心无数，顽劣如我才有机会踉踉跄跄地完成这样一篇论文。

本文的选题是由王老师拟定的，调查和写作的过程也多蒙老师指点，尤其是导论的写作，几乎是在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中完成的。只可惜我自己学力低微，无法呈现老师的想法，更不要说写

出让老师满意的论文了。

本文的完成还要感谢山西大学的行龙教授和他领导下的华北研究中心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他们让我在初入田野的时候就有了回家的温暖和依靠。我的田野工作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上，行龙老师的工作是让人无比震惊和尊敬的，这帮助我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华北研究中心的很多老师都曾与我讨论过论文，并给予我宝贵的指导和启发。

我还要感谢那些在田野中不厌其烦地回答我的问题的父老兄弟们。小站营村委会为我提供了免费的住宿，晋源区政府为我提供了饮食上的方便，聂振宇兄帮助我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刘俊英老师和温杰兄无条件地提供了他们珍藏的地方文献。我尤其要提及的是我的两位报告人，郭玉生的广博知识和宽容的胸怀曾极大地鼓舞了我田野工作的信心，而武润生是当地最令人敬佩的年轻学者，他对乡土历史的知识和热情都令我十分感动。如今，玉生和润生已经相继离世，愿他们早离轮回。

我要感谢所有在论文开题和答辩时给予我指导的老师以及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社的所有成员。刘铁梁老师、王建民老师、潘蛟老师、赵丙祥老师和梁永佳老师作为我的答辩委员，都在本文的写作和答辩过程中给予了宝贵的指导。刘雪婷、吴世旭、刘淇、张帆等师弟师妹都曾不厌其烦地与我讨论，并帮助我修订文稿。能够与你们一同度过北大的学习时光是不曾想象的幸运。

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太太齐莉莉在我读书和写作的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方便。在我们这些年的共同生活中，她表现出的坚强和乐观让我由衷地觉得她是个好女人，没能与她分担家庭的压力一直让我惭愧不已。我的父母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他们为子女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让我自惭形秽，是他们为我提供了坚持学业的勇气和决心。

完成这样一篇论文，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我恳请那些这里没有提到的人原谅，请相信，我并没有忘记你们的恩情。当然，本文的所有责任由本人承担。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1

- 一、课题的理论定义 /3
- 二、文献回顾 /10
- 三、本研究的思路：从自然的水到文化的水 /35

第一章 小站营的水 /45

- 一、晋阳与晋祠 /45
- 二、小站营的基本情况 /49
- 三、灌溉之水 /54
- 四、生活之水 /62

第二章 晋祠人的水观念及宇宙观 /75

- 一、仪式之水 /76
- 二、作为天道隐喻的难老泉 /89
- 三、道德宇宙观 /93

第三章 晋祠水神与古晋阳的水鬼 /117

- 一、祭祀圣母的仪式 /117

- 二、神今坐瓮主山川 /125
- 三、系舟山头龙角秃 /137
- 四、血食如何配女郎? /142
- 五、尾闾真解泄沧溟 /154
- 六、道德宗教与祈福宗教，兼论德福一致的可能性 /159

第四章 晋水源流及其道德呈现 /172

- 一、宋代以前的灌溉 /172
- 二、宋元时期的灌溉 /174
- 三、明代灌溉 /181
- 四、油锅捞钱与文化的河流 /185
- 五、雍正七年之后的晋水北河灌溉 /196
- 六、水磨与造纸 /226
- 七、洪水 /229

第五章 礼与流域社会 /235

- 一、作为天命流行的礼 /236
- 二、晋水灌区的道德一体性 /244
- 三、礼治的水利管理体系 /252
- 四、村落关系的其他面相 /255
- 五、“人情好，水就好” /268

第六章 污水灌溉 /270

- 一、渠长甲制度的变迁 /270
- 二、用水制度的变革 /274
- 三、污水灌溉 /279
- 四、难老不再 /289

第七章 结论：天地之大德曰生 /293
一、道德宇宙观、礼与民间宗教 /294
二、水与土互动的框架 /297
参考文献 /305

导 论

大凡人类学家都相信，越是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事物，背后越是有着深远而难以看透的文化意义。“水”就是这种“难缠”事物的典范。从饮食洗涮到田间地头再到江河治理，从民间祭祀到哲学论述再到神话传说，水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绝不只是生产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是一种贯穿了自然与养育、实践与象征的多少有些不可言说的物质。

对于人类学来说，水固然不能算是一个陌生的题目，但以水为核心的民族志作品却尚待书写。

中国人类学之一大局是乡村研究，而乡村研究借助的方法为民族志。诚如王铭铭所说，这类特殊形态的民族志都是围绕着土地概念建立起来的，在它们中，水一直被当做一种自然存在物来看待，其在人文世界中的意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王铭铭，2006）^①。鉴于此，王铭铭近年引据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有关论述指出，应以物的人类学来重新思考“乡土中国”概念，尤其是要从土与水之间的关系来展现中国社会围绕“居”与“游”形成的双重结构关系，使中国人类学更切合中国社会既有的双重特征（王铭铭，2006）。

我这篇有关水的人类学论文，在思路受到王铭铭上述讨论

^① 引文出处简写，详见本书参考文献部分。下同。

的启发。^① 在本论文中，我将围绕水（特别是水利社会）展开我的民族志考察。如果说物质文化人类学的宗旨在于呈现物的社会性的话，那么，水的人类学研究也应将焦点放在水的社会性的揭示上。而要在中国昭示水的社会性，用民族志的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一个灌溉社区，应是人类学研究者的一个比较便捷而有效的选择，但只关注民族志不单在方法论上过于狭隘，而且在我所研究的山西晋祠，主要的水源难老泉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干涸了。今天晋祠的水利社会是一个历史和当下交错纠缠的场域。因此，本文综合了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方法，力求呈现晋水灌区从宋代直到今天的文化样貌及其内在的历史与文化关联。

2005年，我设计了研究计划，接着，从2006年春天开始，选择在山西展开田野工作。我将自己的研究地点定在晋祠灌区。本文将基于我在这个山西村庄的田野调查中所获资料和地方史料，实验一种以水为中心的历史民族志，使自己的研究与人类学、社会史、社会理论有关水的研究联系起来，提出自己有关水的社会性的解释。

^① 王铭铭对人类学的水研究的关注，或可追溯到从《逝去的繁荣》（王铭铭，1999）开始的对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研究。他对泉州等地的调查，大多集中在海运方面。王铭铭认为，海洋交通的研究若不能与内陆汉人社区的水问题联系起来，便有缺憾。2004年，山西大学行龙召集了一个区域社会史研讨会，会上山西大学的几位学者分别发表了关于山西中部盆地的水利研究方面的论文，王铭铭会后发表了一篇题为《“水利社会”的类型》（王铭铭，2004）的文章，将中国的水利社会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以都江堰为代表的“丰水型”，一种是以山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为代表的“缺水型”，还有一种则是以内河航运和海运为代表的“水运型”。泉州和开弦弓（费孝通，1985）都是水运型社会的典型案例；对于“丰水型社会”，古今中外的宏观历史和水利史研究立论高远，汗牛充栋；而从立志翻历史的垃圾箱的人类学看来，“缺水型社会”所昭示的“水利资源与区域性的社会结合，可能是一个远比‘治水社会说’更为重要的论题”（王铭铭，2004）。而且从微观社会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对聚讼不息的“治水社会说”不无反思的意义。

一、课题的理论定义

我认为，在中国围绕水的社会性展开民族志叙述，必须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

首先，20世纪以来，以中国为对象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将中国当做一个“治水文明”来看待，一方面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端和国家的形成都得益于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另一方面认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仍旧要从大规模治水农业的模式来理解。这种带有强烈的东方学色彩的看法大有值得反思的余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说：“帝国的政治胚细胞，筑堤防洪和修运河以利内河航运（主要是为了运粮草）是第一位的，而灌溉为目的的运河建设只是第二位的。”（马克斯·韦伯，1995）魏特夫（Karl Wittfogel）也认为，在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的建设中，徭役一直是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为了征集、组织和管理这些劳动力，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必须的。持这样观点的不独是西方的学者，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虽然没有直接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但他所说的“半封建”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意思，而且他和韦伯一样认为，统治者修建水利工程的第一目的往往不是灌溉，而是为了运输贡纳谷物，唯有到了农民被压迫得无法生存，到了揭竿而起的边缘的时候，才会用心发展灌溉事业（冀朝鼎，1986），这在魏特夫看来就是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治水社会说”实际上来自以西方中心主义对东方的想象，历史学界对此已经多有批判（李祖德、陈启能，1997），大多数中国史学家都认为，这样的看法实际上是倒果为因地将中国国家的功能当做了国家得以发生的原因了。

我更希望能够用一个具体的灌溉社区的例子，来分析国家究

竟在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上发挥了什么作用，用民族志材料与魏特夫等人的观点进行对话。从史料来看，在1950年之前，整个晋祠灌区一直由一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渠长甲体系来管理，国家除了在发生诉讼时出面协调干预之外，对整个灌区的介入其实非常有限。^① 这些渠长、渠甲都是当地村民根据传统推选出来的。这个制度从元代产生，经过清朝初年的一次整顿之后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1950年，渠长甲制被废除，但新中国组织的水利管理机构在村落的水资源分配上也还是延续了从前的机制。

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这样一个几乎完全自治的水利社会如何得以完整地延续数百年之久？在没有国家专制的情况下，这样一个大型的灌溉系统又是如何运行不辍的？其实早已经有类学家以东南亚的灌溉农业为调查对象进行过类似的反思性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如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尼加拉：19世纪的巴厘剧场国家》中对灌溉会社的研究，已经言明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反思了（格尔茨，1999）。但格尔茨研究的毕竟是一个无国家社会，至少是国家没有强大中央集权的社会，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邢台闸会的研究本来可以给出一个国家权力极为成熟和强大的社会中的例子（杜赞奇，2004），但杜赞奇显然兴趣并不在此，他对邢台水利组织只有十分简单的介绍。因此，这方面的研究仍旧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后文中将证明，晋祠的灌溉事务应该被当做的一个包括了国家在内的体系来看待，并不能割裂成国家与社会两个部分。

其次，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中国”的概念几十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国内外的人类学者对中国的理解和书写，该如何理解

^① 详见第四章。

汉人社会中的水与土之间的关系？在费先生看来，汉人农民由于对基于土地的农业生产方式的依赖，养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并由此形成了以相互孤立隔离的村落为基本形态的居住模式，以及村落中世代相传的熟人社会（费孝通，1989）。费先生对于中国社会的论述涉及众多方面，并不局限于“乡土中国”。理解费先生不能拘泥于“乡土中国”一词。有鉴于此，王铭铭在《居与游：侨乡研究对“乡土中国”人类学的挑战》一文（王铭铭，2005a）中，利用福建塘东侨乡的个案指出“乡土中国”概念只不过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该文认为，中国的“耕读传统”本身就蕴含了扎根乡土和学而优则仕两种相对反的趋向，因此在“乡土中国”中本就包含着一个深远的“流动的传统”，塘东村世代的海外移民史以及因此产生的“双边共同体”都可以看做这一传统的产物。《居与游》主要针对的是“安土重迁”的观念，王铭铭认为，对于“乡土中国”这个概念可以追问的是，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本身是一种自足的生产资料吗？事实上，在中国北方广阔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土地的农业生产价值几乎完全依赖于灌溉，不能获得充足水源的土地，价值就会随之降低，而完全无法灌溉的土地在农业生产上几乎就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人们不只是依赖于土地，由于日常生活中同样要用水，在这些地区，人们对水的依赖甚至更为深切。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水的重要性，他曾经指出，人们聚村而居的众多原因之一就是在水利方面进行合作（费孝通，2004）。而晋祠灌区的农田灌溉却表明，水利必须在一个流域系统内进行，单是一个村落内部的合作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为了协调用水，一个流域内的村庄就不可能是彼此孤立和隔离的，反而必须经年协商水资源的分配管理事宜，很多流域内都形成了跨村落的用水协会。在这样的地区，对一个村落社会的研究和理解必须要放在流域社会的背景下才可进行。

“乡土中国”自然并不是一个局限于农业实践以及从农业实践中生发出来的生活习惯的概念，而是一种理解中国农村、尤其是汉人村落的范式。这个范式包括了血缘、礼俗、道德等多个相互联系的概念，而“乡土”正是作为这一系列社会制度在象征层面的根据和本喻。因此，对“乡土中国”的理解和反思都不能局限于“安土重迁”，问题的核心也并不是流于社会与孤立的乡村之间的差别，而是要找到一种更加符合历史的文化结构来和“乡土中国”相对话。“水”无疑是一个不论在实践还是象征层面都和土同样重要的因素，一个水土互动的框架对于理解汉人村落是非常有用的。

因此，对流域与社会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在方法论上，人类学必须将流域作为基本的研究单位，只要充分意识到一个流域内村庄之间的关联性，照顾到土地的固定性和水的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村落仍旧可以作为合法的研究单位。我将要调查的山西太原小站营村就是这样一个处于晋祠灌区内的村落，晋水从难老泉流出之后，分成南河、北河、中河和陆堡河四个灌溉体系，从明代初年开始，各灌溉体系内的各个村庄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分水制度。以北河为例，花塔村为北河之首，设都渠长一名，总管北河水务。北河又分上下两河，小站营为下河之首，分管下河五村。每年三月初一放水，花塔村人不到，不能决水挑河，工费收缴则由上下河首村的渠长负责。在祭祀水源之神晋祠水母方面，由于当地传说水母柳春英乃金胜村人，因此每年祭祀，金胜人不到，祭祀不能进行。小站村和小站营村因同渠灌溉，因此渠长甲为一个联合班子，每年卖水、祭祀、缴费全部都一同进行。由上可见，一条灌渠已经将上下游多个村落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紧密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网络，而水渠则仿佛一个流动的纽带，将每个村子的一举一动都传递到网络中其他村子中去。历史上，晋祠周边的数十个村庄全部都利用晋

水灌溉稻田，并由渠长甲制度来协调管理晋祠四河的水务。要解释这个村落的历史变迁，就必须考虑该村落和整个灌区之间的关系。

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工矿业与农村争夺水资源已经日益成为影响村庄用水的重要因素，换句话说，水不但将一个流域内的村庄关联了起来，而且将村庄与工矿产业关联了起来。这固然可以看做工业化、城市化对乡村生活的冲击，但更为重要的是，这其中蕴藏着水观念和水权观念的变迁。一般说来，工矿业和村落争水有两种方式，最为常见的是利用河流、灌渠作为工矿企业的排污渠道。还有一种方式是工矿业从农村河流或地下水中采水。在山西省定襄县河边镇，太钢集团的大盘山镁矿正在扩大开采地下水的数量，目前还没有和河边村的村民产生直接的冲突，但随着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长远看来，用水紧张会成为当地迟早要面临的难题。由于工矿业的资本和技术力量都远大过村落，而且有国家的支持，所以在历次争水的过程中，村落总是处于下风。在晋祠流域，工矿企业和农业之间的水争一直十分紧张，1994年难老泉彻底断流，当地人说，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太原化工区的两组机井大量开采地下水。早在20世纪60年代，太原市化工区就打了三组机井，大量开采地下水，造成难老泉水量急剧下降，并引起了当地农民的强烈不满。在太原市政府的协调之下，其中两组机井被封，另外一组很快就被拆除了，化工区开始直接使用难老泉的水，晋祠灌区和化工区达成了返水协议，晋祠向工业区提供一个流量的净水，工业区返回一个有效流量的净化后的工业废水。但化工区提供的废水质量非常不稳定，有时根本就是没有净化过的废水，秧苗被毒死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化工区由于水不敷用，动辄私开机井取水。1994年，该协议终于因泉水枯竭彻底废止了，双方又开始争夺地下水资源。如今晋祠灌区地下水的管理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局面，国家禁止用于非生活用